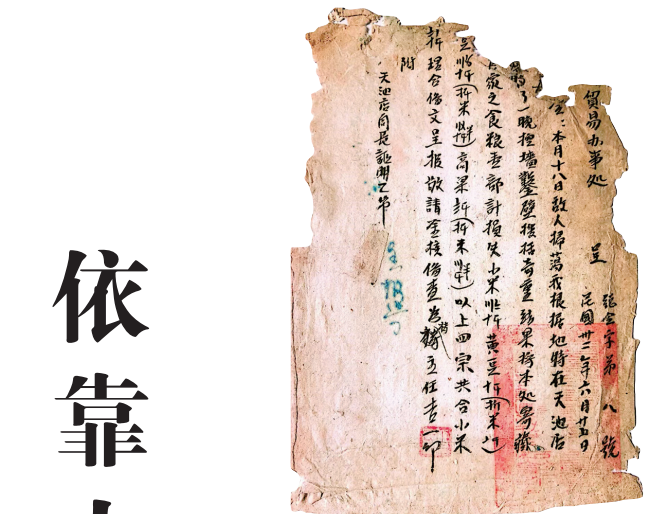


文物无声,历史有痕。

本期《文博》聚焦几件抗战文物,它们或藏于民间,或展于厅堂,共同勾勒出三晋大地上可歌可泣的抗战图卷。柯璜先生刻石立碑印制传单,彰显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担当;一份记载政府损失情况的报告,展现了娄烦地区全民抗战的真实图景;一幅军事地图,见证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段史实;一封插着鸡毛、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体现了烽火中传递情报的智慧;《侵略者的命运》木刻漫画,以艺术为投枪,揭露了侵略者的狂妄与必然败亡的命运。

——编者



静乐县贸易局办事处呈报县政府损失情况的报告(作者供图)

这份藏品是1943年6月18日,日寇在静乐县六区一带(今娄烦县天池店乡)“扫荡”后,静乐县贸易局办事处呈报县政府损失情况的报告。原件为麻纸毛笔书写,高22厘米,宽14厘米,边缘有少部分残缺,但意思基本可通,原文为(标点为作者加):

贸易办事处 呈 总会字第八号

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①鉴:本月十八日,敌人“扫荡”我根据地时,在天池店□□②了一晚,挖墙凿壁,搜括(刮)奇重,结果将本处寄藏□□③家之食粮壹部,计损失:小米三十七斤,黄豆十斤(折小米六斤),□④豆三十五斤(折小米二十四斤半),高粱八斤(折小米三斤半)。以上四宗共合小米七十一斤,理合备文呈报,敬请审核备查为禱。主任吉一叩。

附 天池店区长证明二纸 呈报 7月18日

注①推测为“县长钧”三字,合为“县长钧鉴”,即报请县长审批。末尾“呈报7月18日”应为局长签字,表示文件已上报处理。虽然贸易局长和办事处主任同为吉一,但手续应该如此。②推测为“驻扎”或“骚扰”。③推测为寄藏粮食的户主名字。④推测为某种颜色的豆类名称。

“为禱”是敬辞,书信结尾用语,表示请求、盼望或祝愿的意思。

区长为村的下一级“闾”的长官。因娄烦境内大部分村庄住户不多,所以许多村庄区长就相当于村长。

这份材料,是娄烦县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记载日寇“扫荡”的文字证据。

1937年10月,中共静乐县委和中共静乐二区(娄烦地区)区委成立。1939年3月,日军占领静乐县城,中共静乐县委迁到娄烦。当时,日军经常外出“扫荡”,给娄烦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中共静乐县委和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娄烦军民同仇敌忾展开了殊死斗争。

1941年初,为了扭转根据地物资匮乏的局面,迅速搞活经济,扶持生产,以保证军民正常生活,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贸易局,张静山任局长。1942年7月,吉一任局长兼办事处主任。这份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就是当时在娄烦发生的事。

当时,县委、县政府及其下属单位都是游击办公,所有钱币由工作人员保管,货物、粮食等无法随身携带的财物寄藏在老百姓家中。这份材料生动呈现了娄烦地区全民抗战的真实图景,群众不仅慷慨捐钱捐粮支援前线,更不惜冒生命危险为政府保管抗战物资。日寇“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报告中所提到的损失并需要注销的,只涉及民主政府的公粮,群众的损失难以估量。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物管理仍然是十分严格的。

烽火石刻与抗战传单

郭悦



《正气歌》石刻(山西博物院藏)

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烽火岁月中,教育家、艺术家柯璜以笔为刃,将文化血脉筑成抗战的精神堡垒。几件穿越硝烟留存至今的文物,不仅是他艺术的结晶,更是其民族气节的铮铮铁证。

《正气歌》石刻 民族魂的永恒铭刻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随即铁蹄践踏东北。时任山西省图书博物馆馆长的柯璜愤然挥毫,以四页巨幅行草书写下文天祥的千古名篇《正气歌》。完成墨稿后,他自费将其勒石,并朱拓900余份,分赠予全国师长以上军官及各界名流,期望以浩然正气唤醒军民抗敌之志。1937年太原沦陷前夕,柯璜将石碑密埋于太原文庙地下,携家人赴重庆避难。这一埋藏,让石碑在日军铁蹄下奇迹般保存下来。

2025年初,这块尘封88年的石刻在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特展中首次公开展出。斑驳的刻痕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依然激荡。

该碑石书法以行草书写,单字高约15厘米,整体气势磅礴,融合张旭之狂放、怀素之奔逸,董必武曾评其书法“浑灏流转,穷极笔势”。

抗战传单 纸上的烽火号角

抗战期间,柯璜以诗文为枪,创作《告三岛士民歌——寇陷南口在太原作》《冢人骑狮预言歌》《述平绥正太同蒲平汉陇海浙赣道上见闻八首》等文,痛斥日军暴行,并自费印制成传单,宣传抗日。

《告三岛士民歌》创作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时值日军攻陷南口(位于北平西北45公里处燕山余脉与太行山的交会处,为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是北平通向西北的门户),太原危在旦夕的生死关头。在太原防空洞中,柯璜以悲愤之笔写下这首长诗,将其视作“毛锥亦矛戟”的文化武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呼吁日本民众“悬崖勒马”,否则必“自取灭亡”。诗中他痛斥日本政客、军阀与浪人集团的狂妄野心,直指其侵略行径,并预言其终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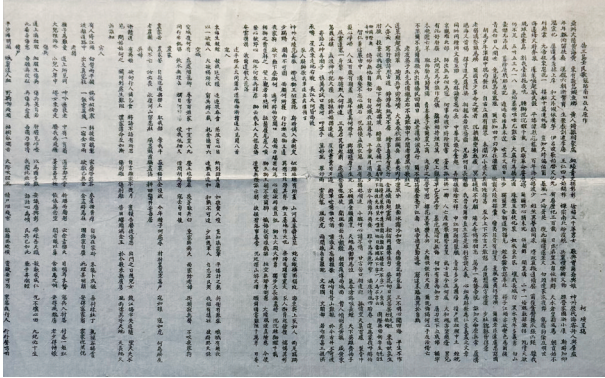
受历史严惩。

1938年,日本侵占中国更大面积的国土。柯璜在前往重庆途中创作了《冢人骑狮预言歌》(下简称预言歌)。他以沉睡狮王隐喻中国,以猪猡喻日本,记叙一头自不量力的猪跳到狮王背上企图侮辱狮王,结果狼狽丢掉性命,再一次预言中国抗战必胜。这是他运用书画特有的形象思维而创作的诗歌,此预言歌首先登载于《大公报》和《抗战诗坛》上,全国其他地区报刊争相转载,重庆国民政府将此歌印成传单,在敌占区空投。

《述平绥正太同蒲平汉陇海浙赣道上见闻八首》创作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柯璜从太原避难重庆途中。诗中“平绥、正太、同蒲、平汉、陇海、浙赣”等铁路线串联华北、华中和华东,覆盖了当时中国主要的战略交通网络。柯璜以亲历者视角,描绘了日军入侵后沿途城镇的残破景象、难民流徙的惨状,以及军民抗战的片段,具有强烈的纪实性。该组诗为八首,分别为《寇人》《空城》《农家》《寡妇》《富人》《老弱》《伤兵》《积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柯璜将其印制的传单直接邮寄给日本天皇和时任首相的犬养毅,试图以道义警示日本当局。犬养毅收到传单后,曾回信赠诗柯璜:“百虑谋犹拙,一言迷自开……忌心都去尽,何复病尘埃。”诗中隐含对柯璜劝诫的认可。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因反对主战派遭刺杀身亡。

柯璜的抗战贡献以文化为根基,融合教育、艺术与学术,形成独特的“儒者抗战”模式。他通过刻石立碑、书画义卖、分发传单等形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抗战动力,彰显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担当。



抗战传单(山西博物院藏)

在山西省图书馆正在举办的“三晋烽火 红色印迹——文献里的山西抗战展”中,一封泛黄的麻纸信件放置在展柜中。这封信高26.3厘米、宽22厘米,麻纸,朱墨油印,文字竖行,边角残破。最引人注目的是信的下方斜插着一根鸡毛。这封1941年的鸡毛信,曾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最紧急的情报。

这封信属于民间红色文献收藏家王海勇,其情报内容发自陵川县政府,没写具体送达方,故发往对象不止一处。在此信件左上有毛笔手写“平顺县政府”等字样。

由信件内容可知,此封信是1941年6月27日从陵川县政府发出,同年7月3日,亦即一周后平顺县政府第四科收到,并于次日交政府存档。

鸡毛信是抗战烽火中传递情报的特殊形式,其名始于1939年“晋西事变”后的太行山区。面对日军封锁导致的情报滞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将领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创新提出“以鸡毛为信使”的紧急通讯方式。信封上插一根至三根鸡毛,分别代表不同级别的紧急军情,无需邮戳邮票,见羽如令。黄克诚曾赋诗赞其:“鸡毛传期遇,相约斗日阎”,这种源于山西牺盟会的土办法,迅速成为各根据地的“千里眼”。

平顺与陵川均为太行根据地的核心区域。1941年,正值根据地极为艰难的岁月,敌人对根据地军民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与“囚笼政策”。但在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军民通过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及强化党的领导等系列举措,成功克服困难,突破敌人封锁,不仅收复失地,更使革命力量持续壮大,逐步实现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传递情报的鸡毛信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封鸡毛信

王荣

见证合作的一张地图

的敌后武装力量控制地区。同时在蓝色区域标示着多处可为飞机提供临时着陆地区的位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宣战。中共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强调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提出“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将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合起来。

随着欧洲战场大势已定,盟军开始将重心投向亚洲战场。1943年,美国将援华航空志愿队(飞虎队)扩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驻扎桂林机场,全面负责在华对日空战。在此情况下,美国认识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不容忽视。美军迫切需要敌后根据地提供气象情报并营救降落在此地的盟军飞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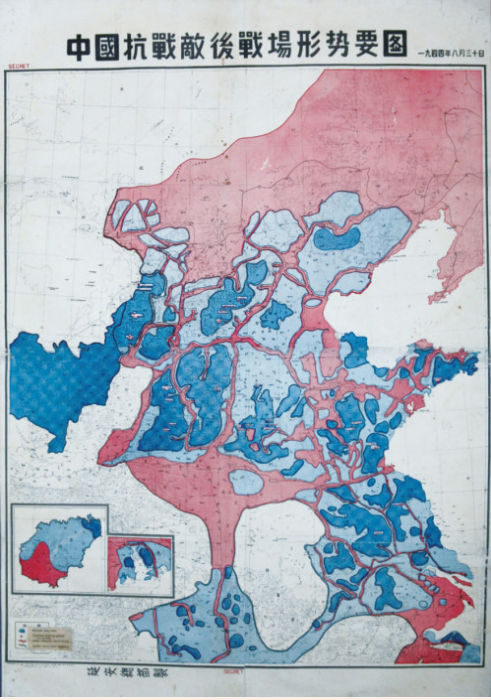
在中共中央的邀请下,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包瑞德作为美军观察组组长,代表团方于1944年7月抵达延安,开始为相关事宜进行接洽。

《解放日报》特于8月15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其中“战友们”三字是毛泽东同志特意加上的,可见对日作战方面,双方已经形成共识。9月9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要求各地对观察组的工作充分予以配合。

应美军请求,延安专门成立了由各根据地代表组成的空地救援委员会,负责协调营救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坠落美军飞行员的工作。在中共中央的统一安排下,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开始在条件适宜的地方开辟供飞机临时起降的场地。

此图即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在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为美军飞机预设了大量着陆点。据统计,直至日本投降,抗日根据地军民共营救以美国飞行员为主的盟军人员102人,并为此付出牺牲110人的代价。可以说,此图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美军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一段史实。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供稿,本版编辑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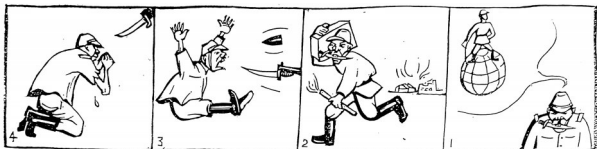


《中国抗战敌后战场形势要图》(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藏)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中收藏有一张《中国抗战敌后战场形势要图》,该图绘制于1944年8月30日,为纸质石印版,由上下两幅拼接而成。此图系由延安八路军总部与驻昆明中国战区美军总部航空地面营救总部别动队(A.G.A.S.)联合制作,用于营救迫降于敌后根据地的美军飞行员及其失事航空器。

左下角英文译为:美国航空营救总部别动队提供参数,美国陆军航空第十四队A-2分队制作,美军司令部第907工程团重新印刷。

图中红色部分为日军控制地区,可以看出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灰色部分为国民党军控制区,蓝色部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侵略者的命运》(桂林博物馆藏)

侵略者的命运

钩希

在晋祠博物馆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艺术展”上,蔡迪支创作的木刻漫画《侵略者的命运》深深吸引了我。

这组四格漫画采用从右至左的叙事顺序,粗犷凌厉的

刀锋线条勾勒出简洁而极具张力的画面。四幅作品依次刻画了日本侵略者从“妄图征服地球”的野心膨胀,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暴行肆虐,继而“遭遇抵抗仓皇惊恐”,最终“彻底溃败跪地求饶”的完整轨迹,以直观易懂的画面,深刻揭露侵略本质,昭示正义必胜、侵略必亡的历史铁律。

蔡迪支是抗战时期活跃于桂林的重要木刻家。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辗转桂林,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投身救亡宣传。彼时的桂林作为大后方文化中心,汇聚了欧阳予倩、徐悲鸿、巴金等千余位文化精英,形成了以报刊、展览、戏剧为载体的“抗战文化城”。木刻艺术因制作简易、传播迅捷,被鲁迅誉为“顷刻能办”的革命利器,成为文化抗战的主力军。艺术家们以刻刀为笔、木板为阵地,创作了大量揭露侵略暴行、唤醒民众斗志的作品。

《侵略者的命运》诞生于1939年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作为战时重要的宣传载体,此类木刻作品常被批量印制于报刊、传单或制成布画张贴街头,成为刺向敌人的匕首、唤醒民众的号角。

鸡毛信(王海勇藏品)

